



张研 / 著

17-19世纪中国的
人口与生存环境

黄山书社



「康乾盛世」研究
丛书

张研 / 著

17~19世纪中国的
人口与生存环境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19 世纪中国的人口与生存环境 / 张研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 1

(“康乾盛世”研究丛书 / 陈桦主编)

ISBN 978-7-80707-864-7

I. 1… II. 张… III. 人类环境—研究—中国—17~19 世纪
IV. X2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213 号

出版发行: 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7 层

印 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康乾盛世”研究》序言

作为史学研究,“康乾盛世”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瞩目,而且其关注程度有愈益增加之趋势。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最后 10 年中,以“康乾盛世”为题发表的学术文章,在中国大陆有 18 篇,而进入本世纪后的第一个 5 年里,同类命题的文章则增加到 31 篇。若以清朝康雍乾社会为背景的研究论文,则更多达数百篇。^①事实上,人们对“康乾盛世”的注意,远远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其最早可溯及清代的康熙年间。也就是说,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已经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康熙十二年(1673)的六月初九日,康熙皇帝设宴瀛台,与群臣共赏荷花。大学士图海等奏称:“臣等躬逢盛世,愧无寸长,仰国酬万一。今荷皇上隆恩赐宴,天语殷勤,虽家人父子无以逾此。”^②此奏明显带有阿谀奉承之意。其时,清朝统治者争夺全国政权的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又逢雄踞一隅的三藩异志欲乱之际,

① 数据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② 《清圣祖实录》卷四二,康熙十二年六月丁未。《康熙起居注》该条记载为:“大学士图海、李蔚等奏曰:‘臣等躬际盛时,本无寸效,正愧不能仰酬万一。今荷皇上特恩赐宴,又蒙天语殷慰,虽家人父子无以逾此,臣等何以克当。’”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02 页。

应该说毫无“盛世”之象。但是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稳固,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繁荣,“盛世”之说遂得官方认可,并逐渐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譬如,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出生的人丁,在清朝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或“盛世人丁”;高龄儒生参加科举的现象,亦被誉之为“盛世休征”等等。各种所谓的祥瑞,也时常冠以“盛世嘉祥”之语。清代文献中“盛世”词语的使用也日渐频繁。如记载清朝政务活动的《清实录》,“盛世”一词在康熙朝《实录》中出现过6次,雍正朝5次,而在乾隆朝则高达37次。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辑录道光朝以前政府官员及学者经世文章的清人文集,在这部集子中,“盛世”一词被使用了31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意愿和人们关注的程度。

“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同样受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重视。自明末以来,逐渐深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不断地将他们所收集到的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信息传递回欧洲。传教士们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王朝的精彩描述及充满赞叹的感受,不仅使西方国家开始了解18世纪的中国,而且也唤起了他们对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浓厚兴趣与向往。沙守信是耶稣会神父,1701年来华。他在1717年去世前,大部分的时间在中国江西省传教。他曾在1703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相媲美的。”^①来华的外交官也发出了与传教士同样的信息和感叹。尼·斯·米列斯库曾是罗马尼亚外交官,先后出使过瑞典、法国等国,1675年又作为俄国使节来到中国,并于次年在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在他所著之《中国漫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找不

①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到还有哪一个国家,能有如此辽阔的原野,像中国人这样精耕细作,技艺高超。中国景色之优美,物产之丰盛是无与伦比的。总之,别国的稀有景象,在中国这里却俯拾皆是,再找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能是妄想。”^①

清代的康雍乾社会为何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康雍乾时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政治稳固,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国力强大。其二,康雍乾时期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康乾盛世”所处的18世纪,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间,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替代旧有的模式,大机器工业化生产不仅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同时也无情地摧毁了世界已保持若干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及其传统的秩序。一些国家和民族在新的因素的推动下迅速地崛起,而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过度地沉迷于以往的辉煌之中而不断地衰弱。在这种迭荡起伏剧烈变动的历史演绎之中,“康乾盛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当今天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全球化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候,研究和反思人类近世的历史,中国清代康雍乾社会及其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对太平富裕社会的美誉和概称,也是人们世代企盼向往的盛景和评判统治阶级治国行政的准则。在古人眼里,“盛世”的含义是多方面的。譬如,“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②这是政治上的标准。“盛世”大都以行德政为其基础。“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儆。”^③政治清明,吏治良好。

① [罗马尼亚]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② 《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八》。

③ 《明史》卷八,《本纪第八》。

“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①经济上则以农为本，诸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诸多被人们誉之为“盛世”的历史时期，如上古的尧舜，汉初的文景时期，唐代的“贞观之治”，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这些所谓的“盛世”虽然处于中国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共同特征，即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也许这就是世人衡量“盛世”的基本尺度吧。

不过，“康乾盛世”与以往的“盛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所谓“盛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封建“盛世”之中，正在孕育和成长着机器工业时代的各种因素。而与此同时，脱胎于旧的机体，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在地球的西半部蓬勃发展，生机盎然，它使得以往令人瞩目的中国封建“盛世”的辉煌黯然失色。

我们今天研究“康乾盛世”，并非对其进行简单注解，或夸耀褒扬，而是通过被称为“盛世”的各种表象，深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清代康雍乾社会的基本特点及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盛世”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如前所述，“康乾盛世”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及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学术积淀深厚，研究领域广阔，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因此已经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门的学术领域。

然而时到今日，人们还很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回顾与总结，缺少对以往所得丰富成果的整理与分析，这同“康乾盛世”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影响极不相称。因而，“康乾盛世”学术史的研究被作为了本研究专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共有3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刘文鹏等编著的《20世纪的“康乾盛世”研究》，在广泛搜集和认真阅读上个世纪中外社会有关“康乾盛世”的文论和研究成

^① 《宋书》卷二，《本纪第二》。

果的基础上,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精彩论述归纳整理,根据编著者的认识与理解,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将它们原始地展现给读者,以此反映以往人们对“康乾盛世”认识和研究的发展脉络。张研《17~19 世纪中国的人口与生存环境》、牛贯杰《17~19 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则重点对学术界关于该时期之社会及经济的研究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回顾与总结,同时对相关问题展开学术探讨,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关于“康乾盛世”及其时代的考察是本研究专题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我们仅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展开讨论。李强《金融视角下的“康乾盛世”——以制钱体系为核心》一书,通过对制钱的流通、供应和管理状况的分析,阐述和描绘了货币在康雍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尹树国《盛衰之界——康雍乾时期国家行政效率研究》一书,则从国家行政的角度,探讨康雍乾社会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进而揭示“康乾盛世”时期的某些基本特征。陈桦主编的《多元视野下的清代社会》,以“康乾盛世”所处的康雍乾社会为重点,从更广阔的领域,以多维的角度,通过不同的侧面,考察和描述该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演变,其研究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层社会等诸多领域。

本丛书的研究工作和出版得到了黄山书社的大力支持。在出版学术著作比较困难的今天,黄山书社的领导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不遗余力,积极作为的举动和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谨向赵国华总编、责任编辑徐力编审,以及为本丛书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各位先生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陈桦

2006 年 8 月

写在前面

一、德国学者弗兰克曾不无幽默地自认，他是“观察（研究）树林的人”，而很多历史学家是“观察（研究）树木的人”。

那末，眼前的这部专著，是研究“树林”的专著。

二、历史的“树木”、历史研究的“树木”林林总总，其构成康乾盛世的“树林”，苍苍莽莽、深邃无垠。

本专著从康乾盛世独特而鲜明的外在标志——“人口”切入，将视野稍稍拓展，着眼于17~19世纪康乾盛世“树林”生长的“环境”，题为《17~19世纪中国的人口与生存环境》，依次论述“人口”、“自然大环境与经济小环境”、“社会环境”。

三、没有“树木”就没有“树林”。“树林”从“树木”认识自己，感谢每一株“树木”。“树木”只能在“树林”里生长、繁茂，必然惊喜于窥见“树林”全貌，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四、本专著的宗旨是帮助人们建立对“康乾盛世”，乃至对中国特有发展道路的认知基础，有用而实用，但不可能尽如人意。不足之处，有待同仁继续共同努力。

张 研

2005年深秋谨识于北京知春里

目 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从“人口”切入	1
第一节 旷古奇观的人口数字	1
一、对清代官方册载人口数据的辩证	2
二、清代人口数字面面观	19
三、重建人口数字的方法	32
四、参考坐标与结论	36
第二节 17~19 世纪中国人口的一般状况	44
一、人口的自然构成	45
二、人口的社会构成	60
三、人口的地域构成	88
第三节 关于“人口问题”的问题	107
一、清朝皇帝的错觉与人口“对策”	107
二、“走出何炳棣时代”之后的“马尔萨斯危机” 之争	127
三、围绕“过密化”的讨论	141
第二章 自然大环境与经济小环境	155
第一节 以土地为主的资源	155
一、揭开土地数字之谜	155
二、土地资源向深广延伸拓展	181
三、土地资源的配置	221
第二节 渐失丰饶的自然	240

一、气候	240
二、灾荒：频度与烈度	249
三、旧生态体系的结束	261
第三节 农家收支与“奢靡”之风	285
一、农家生活消费	285
二、农家生计收入	305
三、“奢靡”之风	321
第三章 区划社会环境：国家统治与社会运行	336
第一节 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	336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	336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341
三、行政机构和官僚体系健全完善	345
第二节 “双层统治格局”：县政乡治	349
一、国家政权体系的最低一级：县	352
二、基层社会共生互补的生存空间：“社区” 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组织	368
三、县级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的相互依赖	394
四、士绅：双层统治格局的中坚阶层	402
第三节 赋税与负担	408
一、主要赋税的“定额化”	409
二、关于财政经制支出的“不完全性”	412
三、人民的实际负担	421
第四节 国家统治与社会运行的发展趋势	425
一、18 世纪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425
二、19 世纪中期中国“双层统治格局”的变化	447
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讨论	466
参考文献	478

第一章 从“人口”切入

我们的出发点肯定必须是人，然后才是谈论物的时候。^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第一节 旷古奇观的人口数字

人口，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同社会经济相联系，组成社会群体、进行生命和生产活动、构成社会经济生活主题的，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群。人口数量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如葛剑雄所云，“这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而是复杂得多的双向关系”^②。人口数量，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桎梏。于是，布罗代尔说：“人口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以用它为成功和失败作出总结。”^③

17~19 世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

①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施康强译）：《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9 页。

② 葛剑雄主编、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史·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

于人口。庞大的人口数字成为旷古奇观，也成为 17~19 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独特而鲜明的外在标志。

在官方册籍中，中国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清代乾隆六年（1741）突破了 1 亿（1.4 亿），紧接其后，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突破 2 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 3 亿，道光十四年（1834）突破 4 亿。

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组数字被普遍视为“人口奇迹”、“人口爆炸”、“人口危机”的注脚。而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审视 17~19 世纪中国的人口数字，得出了有别于“人口奇迹”、“人口爆炸”、“人口危机”等的更为深刻的学术见解。

一、对清代官方册载人口数据的辩证

1959 年，何炳棣在美国出版了《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这部被称为在清代人口史研究方面开创了所谓“何炳棣时代”的重要经典著作，直到 1989 年方被葛剑雄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国内出版。^① 葛剑雄发现，“国内 1980 年代称为‘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实际只是重复他（何炳棣）已经作出的结论，还没达到他当年的水平，至少落后 20 年”^②。

何炳棣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对清代官方册载人口数据的辩证。他从赋役制度的层面出发，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官方册载人口数据“丁”的赋役性质，揭示出“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乾隆六年（1741）

① [美] 何炳棣（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此书后更名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由三联出版社于 2000 年再版。

②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研究期待超越——谈复旦版〈中国人口史〉》，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年 3 期。

以前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

一些学者不认为何炳棣是揭示“丁”之实质的第一人。如姜涛征引王世达的著述指出：18世纪中叶，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 J. M. Amiot）即曾说过，所谓“人丁”实际只是“纳税人”；19世纪，英国来华长老会教士罗约翰（J. Ross）亦曾说，中国的“丁”没有人口统计上的价值，只有财政上的功用；1899年，英国外交官庄延龄（E. H. Parker）更明确地说，“人丁”即是“纳税单位”。^①又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有人提出清代史料中的“丁”并非即是“口”时，很多人认为，不仅萧一山、孙毓棠、罗尔纲等学者早有此说，而且这应该属于基本公认的事实。

然而，如曹树基所说，钱德明、罗约翰、庄延龄等人都是历史人物，他们对“丁”的认识，属于“当时人对当时制度的理解”^②。“当时人”，外国人之外，也有中国人明白道出了“丁”的实质——乾隆《丰顺县志》有载：“向例志户口者，即以编征丁口载入。查此项丁口，即归地亩均摊，事属田赋；且编征丁银，原非户口实数，应以烟册编之数为准。”不仅如此，即很多官方册籍本身，也明确称所载“丁”，为“额丁”、“税丁”、“粮丁”、“田丁”等，显别于实在的“人”。何炳棣做的是恢复历史原貌的工作，上述这些，正是可资证实何炳棣研究成果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尚属有限，不了解20年前何炳棣提出的“丁”基本不等于实际人口的论说和其论说早已成为西方汉学界定论的事实。当时的中国学界虽然不至于分不清“丁”与“口”，但关于“丁”与“口”的讨论，多数仅限于“丁”与“口”的折算关系，即一个丁相当于几个口的“丁口比”。因此，以曹树基为代表的多

①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②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数人以为，何炳棣是“从制度入手，全面系统地解决了这一影响明清两代人口史上关键问题的第一人”^①。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有中国学者如潘喆、陈桦、陈锋、刘志伟、陈支平、张研等^②在对清代官方册载人口数据的辨证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就。他们并非简单重复何炳棣的结论（事实上，何炳棣那部经典著作中，关于“丁”的论述只占1/10，其主要篇幅和用力方向在于论述“影响人口的诸因素”），而是从大量史料出发，真正全面系统、丝丝入扣地论证了官方册载人口数据的赋役性质，如果不能说是对何炳棣结论的超越，那末至少是对何炳棣结论的补充、完善、丰富和更加清晰的说明。

以何炳棣为开创者，关于清代官方册载人口数据（包括户与丁）赋役性质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清代官方册籍中的“户”，与自然状态下的“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家”，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户”，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实现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的一个环节，是民人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从而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阶梯。

①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以下参见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陈桦：《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初探》，载于《清史研究集》第六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陈桦：《清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演变》，载于《清史研究集》第七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陈峰：《也谈清初的人丁统计问题》，载于《平准学刊》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载于《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三期；刘志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二期；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国家按户征税、按丁派役时，必定注重“户”、“丁”的编审。那时“家”与“户”，几乎是合一的。唐两税法后，开始以土地作为征税标准，但总的来说，仍是以人丁、土地作为双重征税标准。从明一条鞭法到清“摊丁入地”，赋税征收的标准逐渐向以土地作为单一的征税标准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户”的重视减退了，等级化的户役逐渐变为等级化的丁役制度。乾隆《长洲县志》载：自明代人丁“专事赋役，于人丁重而户口无暇稽矣”。康熙《江都县志》载：“按明制，因田立户，节年推收，田亩或并或增，无常额。至万历则只照丁编银，此志丁、不志户所由来也。”福建《将乐县志》载：“万历年间编赋役全书，遂以丁口名（福建有计口纳钞妇女应征之项，所以计口），而户名渐泯。”^①如此，随着赋役制度的变化，从明到清，在官方册籍中，“户”的实际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初，官方册籍中“户”的实际内容虽然不再像唐两税法那样具有纳税客体（计税标准）与纳税主体的双重属性，但由于实行等级化的户役制度，户役的等级由构成“户”的基本因素——人的数量、身份和财产状况决定。这就决定了“户”的大小仍然同赋税负担轻重直接联系；“户”仍然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家庭组织，户籍仍然具有户口登记的功能。人们为了规避差徭，往往“分丁析户”、“花分子户”。一条鞭法后，户役折银，分别纳入丁银、田赋征收；清朝进而实行“摊丁入地”，以土地作为单一的课税标准，这就使“户”，完全失去了财政上的直接意义。“户”的大小不再与赋役轻重相联系；户籍成了单纯的土地税册，不再具有户口登记的作用。方志和官方册籍中虽仍有“户”的记载，但此时的“户”，已不是原来那种“家”、“户”合一的“户”，“家”与“户”出现了背离的倾向。

^① 乾隆《长洲县志》卷一一，《土田人丁附》；康熙《江都县志》卷四，《田赋户口》；福建《将乐县志》卷一，《赋役志·户口》。